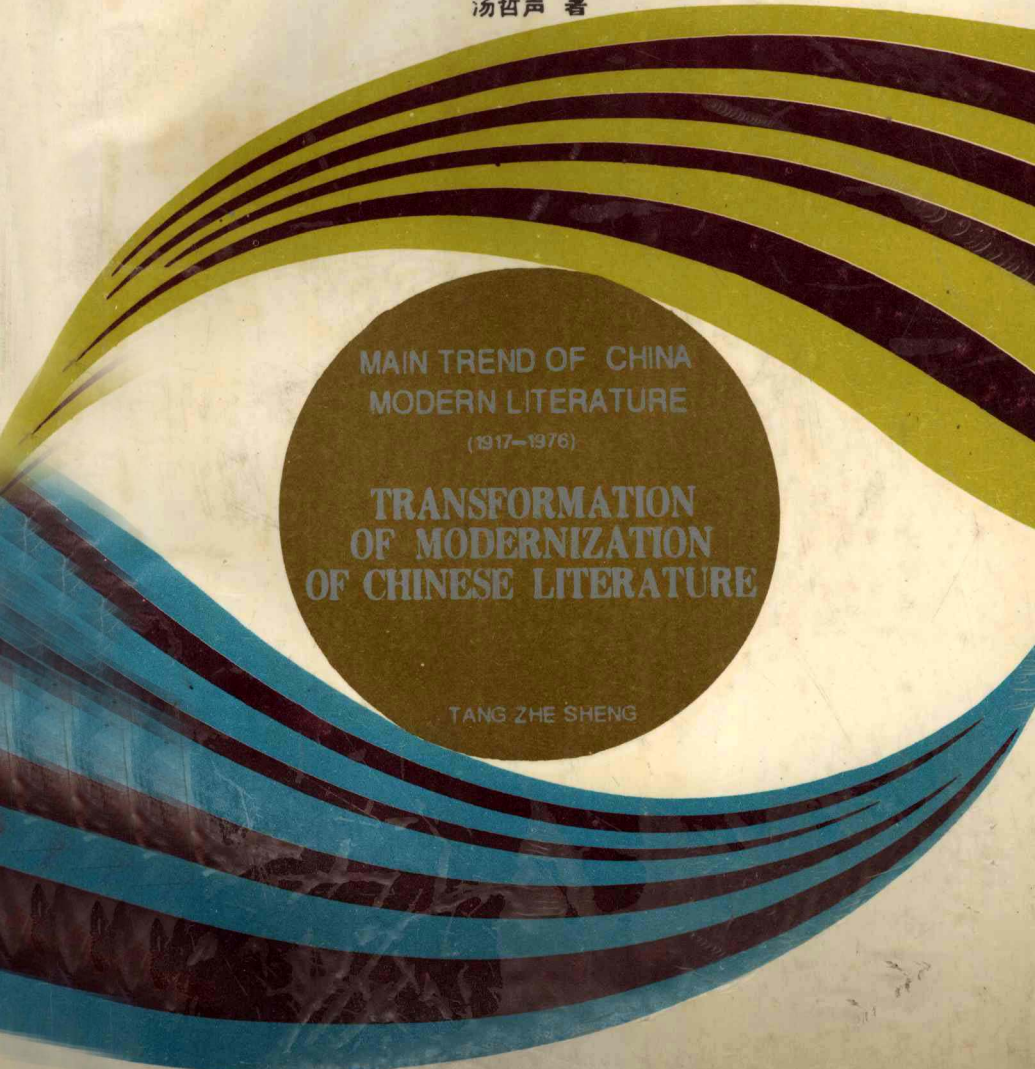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1917—1976)

附 编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汤哲声 著



MAIN TREND OF CHINA
MODERN LITERATURE
(1917—1976)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NG ZHE SHENG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11卷）

第 11 卷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1917—194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1917—1976)

附 编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汤哲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南京

(苏)新登字 011 号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1917—1976)

附编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扬哲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6 千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305-01517-2/1·121

定价:10.00 元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总序

本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比较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潮或主流。究竟什么是文学思潮，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已有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诸如李何林著《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朱寨主编《当代文学思潮史》，侧重于对文学运动、思想论争、理论倡导等方面的爬梳剔括、探幽发微。这似可称作理论思潮。那么，对思潮是否还有另外的认识、理解，我们想是可能有的。至少，与理论思潮概念相对称，可以提出一个创作思潮的概念。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的这个课题正是在确认了创作思潮的概念之后，才确定下的。本课题主要想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时间上涉及六十年，即从1917年至1976年，以六个分册系列论著组成整个课题：第一分册为《“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二分册为《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三分册为《战争与文学》(1937—1949 国统区)；第四分册为《延安文学》(三十年代末至1949，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五分册为《“十七年”文学》(1949—1966)；第六分册为《“文革”文学》(1966—1976)。现代文学的产生有个预备阶段(1897—1916)，“附编”《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是对这个阶段的思潮的论述。这六十年，我们认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至1927年，第二阶段从1928年至1976年(其理由详见第一分

册附录《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一文。

本课题力图显示下列特色：

一、以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一些主要方面)演进过程的宏观把握为中心线索,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结合起来,既大体描述出六十年间文学主潮演进的大体过程与风貌,又对其阶段性主要特征、得失影响作出较为科学的概括论述。第一阶段的创作思潮同理论思潮一样,呈现出“万花缭乱之趣”,但显而易见,“人的文学”是创作主潮。第二阶段时间跨度近五十年,如果作宏观概括,我们以为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与群众的关系的争论、研讨及其实践,既是理论主潮,又是创作主潮,理论主潮与创作主潮尽管关系密切,但分别论述还是可行的、必要的。

二、从六十年间的大量文学创作现象入手进行综合梳理,主要就题材与主题的演进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潮流、人文环境、文学承续联系等方面的关系,并试图总结一些经验与教训,为文学的现实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与创作关系不大的文学论争、意识形态运动等不专门涉及。

三、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试图在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掌握、研究中得出富有研究者个性的结论。我们预料各分册都会碰到一些老的或新的难题,在某些难题的研究上如果持之有据我们将发表一得之见。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正殚精竭虑试图以文学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评判系统。我们的创作思潮研究,应当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寻求的是,为这项工程添砖加瓦的愉快。

本课题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

许志英 邹 恬

1991年6月

导 言

在历史上，很多有价值的事物都在人为的忽视之中失去了光彩，这并不否认客观实在的存在性，因为再有价值的事物不被挖掘，其价值也只限于“存在”。戊戌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变革，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过程。这里面有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本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时刻，本应是文学评论者大书特书的时期。可是，长期以来，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古代文学史中，它作为“尾声”，在现代文学史中，它作为“先声”。不是“尾”就是“先”，失去的是“主”，其中的不安、痛苦和欢乐都化为了冷漠的叙述。我想，这种地位，那些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奋斗的先人们若泉下有知，也将不服的，没有他们的艰苦努力，又何有现代文学的出现呢？“存在”的价值再高也不如挖掘出来更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要寻找一个既能够表现共同的而又能容纳丰富多彩的个性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那就是人的思想形式和人生的情绪。所谓人的思想形式主要指人的思想价值，表现在政治意识和理论形

式上；所谓人生情绪主要指人的主体价值，表现在人的思维和人的心态上。仅用文本的价值评价文学，只是文学的艺术价值，而研究文学需要文学以外的价值判断。用政治的观念评价文学只是政治的文学，只有用人的思想形式和人生的情绪评价文学才能成为人的文学。之所以确立“人的文学”，是因为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文学研究具有较大的覆盖面，人的思想形成和人生的情绪是各种文学现象所反映的更深更广的层面。这种价值判断能够反映出文学现象的内部规律，对一种文学现象（一位作家），注意到了它（他）的辉煌的时代，更注意到它（他）的升降浮沉和变形变态，因为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深层的人的思想形式和人生情绪的机制变化。这种价值判断能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态，它既要从总体上把握住时代的思想形式和人生情绪，又要探求每一个时期的特点，以及每一个作家的思维和心态，这就使得文学研究从单一、简单变为多元和复杂，从程序的僵化、机械变为活泼和灵动。整体性、流动性、个性，搞文学评论的人谁不愿达到这种境界呢？只有依靠“人的文学”的价值判断才能实现。勃兰兑斯在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时曾说：“我将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产生出来的。然而，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座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①写“主流”，但强调的是人的心态，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方法的科学性总是和适应性结合在一起的。戊戌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实际上经过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是晚清的文学改良，一是“五四”文学革命。这两次变革使得中国文学某些方面初步进入现代化，摸清这两次变革之间的关系也就能摸清了这个阶段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本书在论述中最感兴趣的是异中求同，而最后的落实是同中求异。因为求“同”，就能看出中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德国的浪漫派》。

国文学现代化过程如何生成、如何联系的连续性。但是这种求“同”又是为了求“异”服务的，当排除了“同”的因素以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如何转换、如何发展的进步性。皮亚杰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①皮亚杰的这段话给确立本书的写作方法很大启发，任何变革从根本上说都是思维的变革，在求同寻异的基础上，追踪到思维逻辑的变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就能论到点子上了。

国民性思想研究是此时思想革命的中心内容，它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大气候。翻译观、文学观，以及文体、语体，小说、诗歌、戏剧，它们形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主体结构，又以各自的特点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所在。本书也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了思路。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实际上当代世界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美国哲学家库恩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胜惊讶地发现，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FS库恩《必要的张力》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总序 许志英 邹 恬	(1)
导言	(1)
第一章 思想革命和国民性思想研究	(1)
第二章 翻译观: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脉搏	(30)
第三章 文学的观念和文学的价值	(56)
第四章 文章文体和语体的变革	(88)
第五章 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轨迹	(128)
第六章 “诗界革命”和“五四”白话诗运动比较观	(158)
第七章 现代戏剧的改革及其得失	(186)
<hr/>	
主要参考书目	(212)
主要参考杂志	(213)
后记	(214)

第一章

思想革命和国民性思想研究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告诉国人们这样一个现实：要解救中国成为强国的“弱肉”的命运，仅靠船坚炮利、声光电化是不行的，根本的出路是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然要求国人们具备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于是一场研究人、人的价值和对中国人的现状的剖析、反省为内容的国民性思想研究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国民性思想研究实际上表现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大环境中，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如何吸收的问题，因此，国家的观念和世界的意识、中西方文化的评判和扬弃成为了国民性思想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思考这一时期国民性思想研究的出发点。

国民性思想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人生观的研究，它是以人作为考察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制约着其它领域的基本特色。因此，当我们剖析戊戌到“五四”时期国民性思想研究的状况时，实际上也正是在寻找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规律性及其趋向，从而使我们站在一个高度上看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自由”的意识

严复曾将中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为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① 严复认为“崇真”的科学和“为公”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中国的道理原也这样认为，但为何中国行不通呢？问题就在于中国人不自由。于是他提出了：“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②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严复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的“命脉”在于“自由”，二是改革的“根本”在于“国民”。和他向改革者提供进化论——新的思维观念一样，严复向改革者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国民性思想的研究。作为一个先驱者不在于他给中国人创造了什么，而在于他发现中国人缺少了些什么，严复的伟大也就在这里。自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众多的精英分子都寻求国家的生存之路，但都失败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总是把眼光投诸在怎样“治夷”之上，而没有看到华夏大厦的内部早已蛀空，如何“治华”的确是当务之急。严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促使改革者们变“治夷”为“治华”，而且要用“夷”的理论来“治华”。结合严复是学习水师出生，而能从思想领域中提出问题来的事实，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英国留学生的眼光之敏锐了。

当一种思想能形成一种思潮的时候，它需要这一思想得到承认并被发扬光大，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能使先进的思想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梁启超。能敏锐地接受新事物，并使之进一步扩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见王斌编《严复集》第1册。

^② 严复：《原强》，见王斌编《严复集》第1册。

大无疑是梁启超的天才，论及晚清社会所有的改革，几乎毫不例外地都能从他身上看到改革的进一步的深化。严复的国民性思想理论提出来不久，很快就被梁启超所接受。1902年前后，逃亡在外的梁启超写出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论学述之势力左右世界》等论著，特别是他的《新民说》的出现，全面地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国民积弱根源，详细地规划出中国国民的理想人性。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光彩夺目的时期，他的论述使得严复提出的论题形成了系统化，也是晚清国民性思想研究理论最为成熟的时期。梁启超指出了中国国民积弱的五条原因：

“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也”。他认为中国“一局统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他认为“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常有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

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人面前有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在竞争角逐中，中国人是个败者。竞争的意识是梁启超衡量国民性优劣的重要的标准。长期以来，中国人做着“天国威严”“帝国古老”的自欺梦，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就是世界，就是中心，这样的国民怎么能不唯我独尊呢？怎么能不自信自大呢？而唯我独尊和自信自大磨去的只能是竞争的锐力！梁启超是清醒的，他感觉到中国生存在一个“竞争者，进化之母”的时代，任何虚荣心的国民都将要被时代淘汰。他深深怀念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当然他赞赏的不是彼时的“分立”，而是彼时中国的“群治之进实为极点”。

不过梁启超认为以上两条是“天然”的弱源，中国国民性低劣的根本弱源还是“人事”造成的：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梁启超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相隔离，使得“我国民既不得不疲于精力学难学之文字”，而又因此

造成“新事物、新学理”的隔阂；“性灵之浚发”不锐；“思想之传播独迟也”的结果。

“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他认为“由霸者和天下为一姓之产”为制度的国家，人民只能“奴隶盗贼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虽牺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为之，所不辞也。”国家既为专制，人民要么作为奴隶以求赏赐，要么作为盗贼攫取之。如此国民“不萎焉以衰，吾未之闻也”。

“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梁启超认为“孔教之良，固也”，然而自“汉武”以来，孔教就受到了“诬罔”，成为了“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如此下去，欲加变本加厉，全国的思想界又怎能不“销沉极”呢？

说及于此，梁启超的沮丧之情溢于言表，他感到中国国民性低劣的“天然之障”，在世界竞争的风云激荡之中，将会被冲垮，而“人事所为”是“内界”的，是“我辈积数千年之恶因”，决非“鞭策于外”所能动的。他连呼“破坏”！如此“内界”“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

梁启超从历史、地理、语言、国体、学说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国民性积弱的原因，虽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的确看准了中国国民如此积弱的症结，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国民积弱根源的系统分析。

随着这样的思路推进，梁启超很自然地得出了他的结论：这样的历史地理政治思想文化环境只能养成国民一种所谓“适应机能”：奴隶性。他将中国人的奴隶性分为四种：“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造之奴隶”、“情欲之奴隶”。他继续分析道，这些“奴隶性”还可以摆脱，最可悲者为“心奴”：“夫人强迫我为奴隶，吾不乐焉，可以一旦起而脱其绊，……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他痛心疾首地叙述道：“联军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呜呼痛哉！吾语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

惟胆战，吾惟肉麻。”梁启超深深地陷于羞愧和激愤之中，他羞愧中国国民具有如此低劣的国民性，他激愤如此民族性带给中国的奇耻大辱。“如蚕在茧，著著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国无国格，人无人格，如此下去，国将如何不亡。此时的梁启超几乎篇篇文章皆云“自由”，他深深地感到：“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①

“自由”的意识，在戊戌维新之前，严复提出来时，梁启超正忙于政治革新，对这个概念的接受还仅仅是从感情上出发，逃亡在外后他对“自由”内涵的理解深刻多了。他直接接触西方知识，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变化。1899年以前，他著作中出现的“孟”字几乎都是指孟子，而此时提到“孟”字则通常指“孟德斯鸠”的意思。在他的知识贮备中，西方知识的比重越来越大，他的论述中传统儒教加西方知识的综合结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对西方知识的直接宣扬，并以之来“治华”。

他提出了四条“自由”的标准：

一、“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以我为是，勿虑古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的“我”的人格。

二“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丈夫之事也。”人既是“秉天地清淑之气”而生，又为何要随“群动者”而活呢？俯仰随人，不自由耳！

三、“有力不庸，而惟命是从，然则人也者，亦天行之刍狗而已，自动之机器也。”在这“物竞”的世界，一切人都与“我”相斗而未尝休息片断，而“我”却无相斗之精神，那就只能是无主

^①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动性的“刍狗”和“机器”而已。

四、“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曾几何时，而销磨尽矣。”因此“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谓之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如何也！”

论起做人，中国几千年遵循着“一以贯之”的原则：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制、战胜和消除人们的利己自私的心理，达到一种纯粹爱人，利人的“仁”的境界。梁启超提出的“自由”的标准强调的是“自我”和“个人”，如此言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亘古未见，他的价值取向是西方的“个人至上”的伦理道德观。可以说，他实际上给一个古老的国度引进了新的伦理道德的思想。无论梁启超以后的思想发生了如何的变化，甚至回到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上对此时的论点进行“反省”，他的“自由”的标准已展示出了惊人的魅力，在晚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梁启超等维新派大肆鼓吹“自由”，革命派也以此作为民族革命的口号：“西来黄帝胜蚩尤，莫向森林问自由”。^①在婚姻问题上，“自由”更被奉为神明：“万古馨香几媒妁，大家拜倒自由神”。^②小说中出现了《自由花》，戏剧上出现了《自由结婚》。“自由”在晚清社会成为完美的象征。

“自由”的意识是晚清国民性思想理论的核心，它的出发点是“国民”。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中，提出“民为贵”理论的不乏其人，早在世纪前孟子就有“民贵君轻”的思想，^③以后历次的革新，改革家们均以此作为上谏皇上，下恤民情的理论，但和晚清国民性思想理论一比较就能看出，前者仅仅作为古老机器自我调剂的润滑剂，是给一家一姓的王朝提供一剂剂强心针，他们的出发点

① 马君武：《自由》诗。

② 高旭：《题剑雄〈自由花〉说部》。

③ 孟子在《尽心》中曾提出：“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的思想。

是“君”；后者宣布这台机器已太陈旧，已经报废，需要重新建造，并为建造者——“国民”提供了整套的工具，他们的出发点是“民”。这一思想理论的批判点是“专制”。大约在1902年下半年，梁启超写下了一篇重要论文《拟讨专制政体檄》，^①文中梁启超对专制政体严加抨击，认为它是“自由”的真正的阻碍者，他一口气列出了专制政体阻碍“自由”的十大罪状。他决然地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此时的梁启超的确是理论界的“娇子”。

“国家”的权威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的人格呢？梁启超提出的途径是：

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然则爱他主义可以吐弃乎？曰：是不然，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主义生焉。^②

利己——利他——利国——自由，这就是梁启超获取“自由”的途径。梁启超认为人有“私德”“公德”之分，“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固然无“私德”人不能“立”，但无“公德”则人不能“团”，欲为“自由”，就要“私德”和“公德”相结合。但这样还不够，还别忘了“利国”。

^① 见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